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3.004

东夷文化:早期儒家文化的重要来源

秦娟

(烟台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东夷文化是由我国上古时期以我国东部地区为主创造的灿烂文化,早期的儒家文化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东夷地区是崇尚仁爱、礼德的君子之国,孔子悲痛于当世礼制之沦丧,向往东夷保存下来的礼法等思想文化,还有儒家之“仁”深受东夷文化中“仁”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东夷文化影响了殷商文化,殷商文化又影响了鲁国文化。与此同时,东夷文化与周朝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形成了新的齐文化。孔子也正因受鲁文化和齐文化的影响才创立了儒家学说。因此,东夷文化是早期儒家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关键词:东夷文化;儒家文化;孔子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3-0024-04

从东夷文化的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它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儒家文化的渊源可追寻至东夷文化。胶东文化至今保留着明显的儒家文化特征,儒家文化中的精髓——“仁”“义”“礼”“智”“信”“中庸”,与胶东早期的东夷文化有着相似的文化内涵。

一、释义“东夷文化”

关于“夷”,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甲骨卜辞,在已经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含“尸方”“人方”等字样。经过众多学者如郭沫若先生、傅斯年先生、王献堂先生的考证和研究,认为“尸”和“人”指代“夷”。学者认为“尸”在甲骨文辞中多释义为“人”,“人”和“夷”发音相近,声纽相同、韵属阴阳对转,现在山东省沿海地区例如烟台、威海等地方仍然将“人”发音为“yin”,保留着古代发音方式。由此可见“夷”单独使用指代东方某个民族或部落的人。关于“东夷”“蛮夷”,许多文献均有记载。《尚书·舜典》记载:“蛮夷华夏。”^{[1]70}《礼记》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2]1338}《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曰吠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3]816}《说文解字》记载:“夷,东方之人也。”^{[4]460}《尚书·周书》

的“明王慎德,四夷咸服”^{[1]2}与《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子失官,学在四夷”^{[5]1383}。

随着近年来考古的新发现,证实东夷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该区域文化最早能够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岳石文化时期是东夷文化最初成形的时期。此时的东夷人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这点由出土的陶器和农具可以佐证,证实早期东夷文化是一种独立的先进文化类型。夏商周时期,该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频繁,相互影响,日益融合。特别是夏末商初,东夷与商原本为抵抗夏建立的联盟逐渐发展为对立势力,战争使得二者的交流频繁,虽然此时夷人保留了主导的东夷文化,但是夷人中原化已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东夷版图融入中原,与齐鲁文化不断碰撞,终融入华夏,共同组成华夏文化。

综合现有的文献和考古成果可知,东夷文化泛指华夏东部部落的文化,该文化先是独立发展,后与中原文化碰撞、融合,最终汇入华夏历史长河,成为华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之“仁”与东夷文化之“仁”

“仁”是儒家文化的基础,也是其思想核心。这点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多有体现,据统计,“仁”字出现109次。“仁”一方面属于伦理范畴,

收稿日期:2023-02-28

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齐鲁文化历史沿革研究”(L2021Z07070312)

作者简介:秦娟(1984—),女,山东聊城人,烟台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博士生。

另一方面属于政治范畴。《论语·颜渊》记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123}孔子把“仁”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标准,并将“爱人”作为其追求的道德目标。一种思想的影响,往往蕴含于一种文化中。一种文化的影响,往往蕴含于该地的生活特色中。儒家创立伊始确立的目标,是使人达到“仁”,这就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例如《孔子家语·颜回》记载:“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7]225}讲的是成人需要具备的品德。《论语·子罕》记载:“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6]90}《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6]12}儒家渴望达到的教化目的,是以“礼”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仁”的境界。礼,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它是内在的精神状态“仁”的外延。胶东地区文化生活方式是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下日渐形成的,常常包含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往往在普通胶东居民的吃穿住行中体现出来。

一个地域的建筑,是人类生活面貌的反映。儒家讲究“礼”,大到国家典制,小到人生日常礼仪,但凡人生之事(吉、凶、军、宾、嘉),执守“五礼”,才能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筑被称为“石头的史书”,是儒家“礼”的承载物,其建筑形制、规模、样式等都反映了文化历史。例如具有胶东特色的建筑海草房。海草房历史悠久,建筑工艺复杂,据记载有70道工序,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艺术美观性。海草房这种工艺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经秦汉时期的广泛推广逐渐成型,宋金时代广为流行,明清达到鼎盛时期,迄今为止已经演变成一种民俗,代表着齐鲁大地东部的历史文化面貌。海草房在建筑整体布局上左右对称,重要的房间即正房在中轴线上,其他排在线两侧,形成一种错落有致、井然有序的布局。在居室的分配使用上也体现着儒家思想,堂室、东厢房由长辈居住,西部居室小辈居住。在《说文解字》中:“堂,殿也”^{[4]683},认为堂室有着殿之尊。汉代以后称之为“堂”的地方,是皇上及贵族商议国事、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而庶民家庭的“堂”则相当于今天的客厅,是一个家庭重要的议事场所。古代以东为上,因此尊者居东厢房。从居住环境考虑,堂室坐北朝南,接受太阳光照时间长,东厢房次之,冬暖夏凉,适合居住。这都体现了儒家倡导的“礼”观念: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孝悌为先。正是儒家家庭伦理观念“仁”的影响,维系

着小家庭的和谐,维系着大家族的有序,进而促成稳固的社会人伦系统,也映射出胶东地区古朴敦厚、崇尚礼仪的民风。

此外,孔子曰“仁者不忧”和孟子曰“仁者无敌”,孔子认为调节政治矛盾的武器是“仁”。“仁政”后经孟子的发展,成为“王道”政治的先声。《孟子·公孙丑上》中记载:“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8]56}因此“仁政”是儒家追求的政治大同目标。随着历史的发展,“仁”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和精神支柱。

在东夷文化中,“仁”也占据了其文化核心地位。《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君子国在奢比之尸北,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9]298};《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称东夷各国为“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9]389};《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夷”:“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4]460}。段玉裁进一步解释:“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4]460}通过这些古籍的记载,可以看出东夷各国是崇尚仁爱、礼德的君子之国。

孔子生于乱世,当时周朝的人文礼法坍塌,君臣不分、子弑其父的事情层出不穷,孔子向往仁德之治。对于“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古文仁或从尸”^{[4]460}是对死者的悼念之情。李零在《郭店楚简校读记·语丛一》提到:“丧,仁之端也”,认为“仁”起源于“尸”^[10],后衍化为一种道德标准。在甲骨文中“尸”又是同“夷”。《左传》中记载:“仲尼闻之,见于郟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5]1383}《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6]91}对于这里的“九夷”,马融在注解《论语》时认为是指东方九夷。以上看出孔子学“四夷”、居“九夷”是悲于当世礼制的沦丧、向往东夷保存的礼法,那么受东夷文化影响,就是必然的。

三、周公与东夷文化

孔子仰慕夏商周三代,尤其崇西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28},效法周公,而周公与东夷渊源颇深。在成王年幼时,周公辅政,主要功绩是东征

定国、制礼作乐。在他辅政期间,平定了四方叛乱,制定了西周的典章和礼仪,分封诸侯,明德慎罚,敬德保民,施行仁德之政。史称周公有关安邦定国之才,又居功不傲,深得成王信任。《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11]123} 周公接管东夷地后,在保留东夷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注重平衡原有礼俗和周代礼俗之间的关系,缓解了社会矛盾。

随着东征的结束,周朝政治日趋稳定,分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周公制礼作乐,确立社会秩序。作为周公长子的伯禽,封地鲁国。在鲁国的治理上,伯禽延续周公的仁德,包容原有土著东夷和殷居民,殷遗民中亦包含东夷人种。因此该地东夷文化保存较多。例如出土的深腹形式的高圈足簋属于东夷器物,在西周春秋早期,此物普遍存在,说明受东夷文化影响深远。此外在商朝晚期,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和东夷的战争频繁,战争加强了文化交流。

鲁国是孔子的故乡,深刻地影响着孔子的成长和思想修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11]1905} 讲的就是孔子自幼生活在宗周模式的鲁国,儿时玩耍嬉戏,便常会把祭祀时的供品俎豆以及祭器摆列出来,演练祭祀之礼。《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11]1905} 孔子未能达成在鲁国任职的心愿,亦不想求仕于别的国家,可见对母国的忠诚。《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周游陈国时,鲁国季康子执政,召冉求回去从政,孔子说:“归与归与!”^{[11]1923} 劝其回鲁国,实现政治抱负,可见虽远游却心系鲁国社稷。另一方面孔子崇周公有意学习周礼。《论语·八佾》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6]23} 太庙是供奉周公的场所,孔子虚心好学习礼仪,遇到不懂的事情便询问,说明孔子对周公的虔诚。众所周知鲁国保留了周礼,这与周公息息相关,孔子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发出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6]182} 的感叹。后鲁国季氏三桓专政,孔子哀叹礼崩乐坏,反对大臣的僭越行为,欲改当世“无道”至宗周“有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6]174}。可见对周礼的崇敬之情。

因此,东夷影响了殷商,殷商又影响了鲁国,鲁国成为孔子思想的沃土,因此,东夷文化可以说为儒家早期思想提供了重要来源之一。

四、齐国与东夷文化

周代分封制确立后,姜太公受封到东夷地区,建立齐国。齐文化也是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史记》记载:“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12]1477} 吕尚即齐太公,先祖是东海之滨人,祖上因辅佐夏禹治水立功,被封在吕、申,姓姜。武王考虑到姜太公是东夷人,有民族的亲和力,派其管理齐国。建国伊始,东夷各个小国并不服从管制,与姜太公开战。数战之后,了解了周朝以德治国的政策,开始慢慢接受齐国的政策。对此,《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具体描述:“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11]172}

姜太公在治理国家时并没有倚仗强大的武力压迫东夷地区的小国,而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12]1480}。即保留东夷原有俗礼,允许当地居民保持自己的传统习惯,并因势利导开鱼盐通商之利。东夷文化与周文化相互碰撞,形成了新的齐文化。

齐文化的形成,保留了许多东夷文化的因子,所以说齐文化是一种杂融的文化。孔子受齐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那么其受东夷文化的影响自不待言。文献记载孔子多次到齐国。《论语·述而》中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6]70} 这反映了孔子对齐乐的喜爱之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公伐季氏,不克,奔齐,鲁乱。”^{[5]1453}《史记·孔子世家》则记载“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12]1905}。孔子为避鲁国内乱,被迫逃到齐国。在齐国时,齐景公赏识孔子。孔子对管

仲评价颇高,《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弟子子贡对管仲的质疑。子贡认为辅佐纠的管仲,在纠被齐桓公杀死后,不但没有死还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回答:“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6]151} 在这里,孔子认为若没有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一统天下,我们已经受制于外族人了,这也是一种仁。西汉刘向编纂的《说苑·政理》中曾记载:

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进善言,则善无由入矣。”^{[12]221}

这是讲的齐景公问政于晏婴,而孔子听闻此事,对晏子称赞有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拜晏子为师学习之事,而在《论语·公冶长》篇,孔子曾称赞道:“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6]42} 由上述典籍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孔子受到齐文化的影响是自然的。

孔子创办的儒家学派,其核心思想“仁”,与东夷文化中“仁”的思想不谋而合,加之文献所记载孔子对东夷文化的崇尚,可见儒家早期思想深受东夷文化影响。孔子个人推崇周公和鲁国文化,周公与东夷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儒家思想受

东夷文化影响的一个因素;孔子的思想受齐文化的影响,齐文化鉴于姜太公的政策和地域特征,又受东夷文化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早期儒家思想与东夷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家文化吸收东夷文化以及其他优秀文化的精髓,与之相互渗透、融合,这也深刻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包容性与创新性。

参考文献:

- [1] 孔安国. 尚书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2] 孔颖达. 礼记正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3] 范晔. 后汉书[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4]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 [5]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 杨朝明,宋立林. 孔子家语通解[M]. 济南:齐鲁书社,2013.
- [8]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9]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93.
- [10] 李零. 郭店楚简校读记·语丛一[C]//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郭店楚简”专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1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 卢元骏. 说苑今注今译[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77.

Dongyi Cultu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Early Confucian Culture

QIN Juan

(School of Marxism, Yant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tai 264003, China)

Abstract: The splendid Dongyi culture is mainly created by the people in the 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in the pre-history period, with which the early Confucian culture has a close connection. For one thing, the Dongyi region is a noble nation advocating humanity and virtue. Confucius is sad about the ruined rite system of the time and longs for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about the law and discipline rite preserved by Dongyi. Besides, Confucian “benevolence”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benevolence” of Dongyi culture. For another, Dongyi culture influences Shang culture, which then affects Lu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Dongyi culture collides and merges with Zhou culture, which forms new Qi culture. Influenced by Lu culture and Qi culture, Confucius creates Confucianism. Therefore, Dongyi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early Confucian culture.

Key words: Dongyi culture; Confucian culture; Confucius

(责任编辑 陇 右)